

# 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 政治文化认同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BOUT REG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JIN DYNASTY

王耘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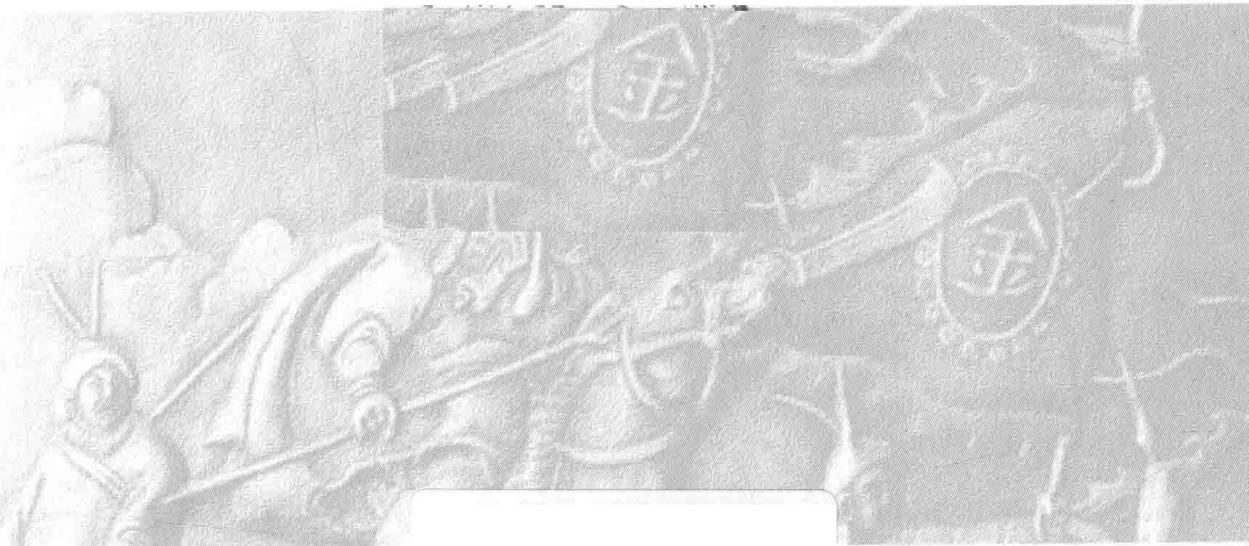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 政治文化认同

王耘 著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BOUT REG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JIN DYNAS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王耘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

ISBN 978 - 7 - 5203 - 0424 - 5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金代  
IV. ①K246. 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7323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08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11YJC770065）成果

# 目 录

绪 论 .....	1
一 选题缘由 .....	1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	3
三 研究内容与思考 .....	13
第一章 女真人的崛起与族群认同的形成 .....	18
第一节 由分散到统一的崛起历程 .....	19
第二节 女真族群认同的形成 .....	21
第二章 文治政策与地域认同的形成 .....	26
第一节 内部的分化与选择 .....	26
第二节 天眷改革与文治政策 .....	30
第三节 “金源内地”与地域认同 .....	42
第三章 女真人的危机与金代的国家认同 .....	46
第一节 海陵王南征与认同的转变 .....	46
第二节 大定天下的族群认同危机 .....	62
第三节 外交礼之争与金代的国家认同 .....	84
第四章 金代政治文化认同的历史印迹 .....	100
第一节 士人文化的选择 .....	100

第二节 国家正统的论争 .....	108
第三节 信仰世界的多元 .....	127
小结 .....	135
<b>第五章 政权危机与国家认同的强化 .....</b>	<b>137</b>
第一节 内忧外患中的国家认同 .....	137
第二节 亡国后的反思与历史追忆 .....	139
第三节 史志存续中的“金源一代” .....	146
<b>附 录 .....</b>	<b>177</b>
<b>参考书目 .....</b>	<b>216</b>

# 绪 论

## 一 选题缘由

12世纪初，女真人倏然而起，迅速从僻处东北一隅到奄有发达地区的半壁河山，势如狂飙。对外他们凭借兵强马壮的军事优势将政治边界不断向南延伸，并从事实上确立女真人“君临天下”的地位；对内他们尝试去消解非女真的异质文化，由此赢得北方包括汉、契丹在内的各民族的政治文化认同，并维持南北对峙局面达百余年。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由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的兴衰一直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若是从宋朝或者是汉人的视角进行考量，会给金朝冠以“异族王朝”“征服王朝”，认为女真人的“南侵”打乱了中国历史的内在进程，以“征服者”面目呈现的女真衰亡史无异于是汉文化的“反征服”史。若以金朝自身的视角来看，女真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才将北方各民族统一起来？生活在女真统治下的汉人士大夫如赵秉文、王若虚、刘祁等，他们又如何看待金、宋及各自的政治文化？本书立足于金朝内部，力图从政治文化认同的角度解读金代，梳理女真由分散的部族到区域性政权进而整合北方各民族并入主中原的历史进程。女真在借鉴汉、唐、宋的政治文化基础上，将北方各民族统一在金朝这一国家中，通过其自身政治文化等措施的推行，使得上自帝王下及士人都有自视为中原正统的意识，当金被蒙元攻陷后，各民族人痛心于金的遽亡，开始主动承担起存

史、反思和保存金文化的责任，为金代的政治文化认同保留了可贵的历史记忆。

认同（identity）一词是近几十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从本源上看，认同首先意味着同一性，在心理学中则将之理解为一种心理机制。其次，认同也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当代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认同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维分析。其中安东尼·吉登斯与法国学者马尔丹都认为认同具有可塑性，即认同借助外在因素来完成自身的建构，尤其是马尔丹，他所分析的文化特质对认同的重构表明认同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sup>①</sup>亨廷顿认为，认同理论是建立在全球化时期不同文明之间对抗、冲突基础上的认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sup>②</sup>涂尔干认为，认同是一种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sup>③</sup>认同有个体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之分，国际政治学界中所指的认同一般是集体认同。

金代政治文化认同也应从集体认同出发，既包括分散的各部族统一为女真族的集体认同，也含有北方各民族融合为金朝的集体认同。对内，集体认同属于该共同体的一种成员资格，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纽带，成员通过这种纽带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外，集体认同证明了与我们不同的他者的存在，并且与他者设立了明确的边界，从而被外界认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sup>④</sup>外界的认可来自与金对峙的南宋。史料就记述了宋末学者的感慨：“女真人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指元）发迹大漠，取

<sup>①</sup> 张旭鹏：《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sup>②</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sup>③</sup> [法]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sup>④</sup> 贾庆军：《当代欧洲文化认同及其建构——认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sup>①</sup> 类似的记述恰好可以表明国家内部成员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二 国内外研究状况概述

国内外相关研究对本书产生主要影响的仍然集中在金史与金文化方面。

### (一) 元、明、清的金史与金文化研究

对于金代历史及文化的研究在金末就已经出现，虽然因北方战乱致使金末文献散佚严重，但依旧保留了较多史料。元修《金史》不足两年，却经历了八十余年<sup>②</sup>的争论才得以完成。《进金史表》中就提到“张柔归《金史》于其前，王鹗辑《金史》于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逞，天历推行而弗竟”<sup>③</sup>。而这些讨论也正好反映了金末以后士人对金朝历史的思考。元修三史以辽宋金各为正统，回避了敏感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它。

明人修《永乐大典》，反而使得金代文献的原貌难以复见。“杂著十亡其七，诗文十亡其八，岂非金源文士之不幸，遭此狗鼠之奇祸耶？”<sup>④</sup> 施国祁在他的笔记中还感慨道：“亭林先生尝言明人著书无非盗窃，金源著述遭此龙溪一劫，真不幸也。”<sup>⑤</sup> 明代对金史及金文化研究较少，一些士人不满于元人将辽、金、宋合为三史，遂以

<sup>①</sup> 虞集：《田氏先友翰墨序》，《道圆学古录》卷五，《四库全书》本。

<sup>②</sup>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开始议修辽金二史，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由丞相脱脱主持修史。其间因体例不定而一直争论不休。

<sup>③</sup> 《金史》附录。

<sup>④</sup> 施国祁：《吉贝居杂记》，《丛书集成续编》本。“想见当日征书时，捆载满前，汗牛塞栋。在局者稍识文字皆惊为无主之奇货……可以全偷者没之，可以抽取者缺之。诸人既已各饱所欲，视阁藏反为弃物……自《永乐大典》成，删削割裂，原书废弃，殆亡佚不少。”

<sup>⑤</sup> 施国祁：《卢氏补金文志说》，《礼耕堂丛说》，《丛书集成续编》本。

宋为正统而将辽、金附于其后，如王洙在《宋史质》中将金视为夷服，柯维骐的《宋史新编》将金列入《外国传》。即便像王宗沐、薛应旟这样为续编《资治通鉴》而提及金代时，也于“辽、金二史削而不书”，以至于清代学者朱彝尊讥之为孤陋寡闻<sup>①</sup>。而将金代历史单独书写的仅有杨循吉所撰《金小史》八卷（后收入金毓黻所编的《辽海丛书》中），叙述了金朝历史发展的大略。

清代统治者以女真后世自居，因此对金朝的历史及文化格外重视。清太宗曾说：“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sup>②</sup>康熙曾公开表彰过刘祁、元好问二人对金代历史的保存所做出的贡献<sup>③</sup>，乾隆时还下诏修撰《满洲源流考》，将金代历史作为满洲崛起的重要源头。他还非常关注金朝的兴亡史，将金亡国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章宗的“渐染华风”<sup>④</sup>。清朝皇帝在历史思考中将女真人入主中原后摆脱野蛮状态的客观效应作为金朝亡国的根源，恰有满洲贵族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考量。对此，清代的一些汉族士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陆陇其就认为“金源氏衰矣，非习汉人风俗之过也……金源氏可谓负汉人之法度矣”<sup>⑤</sup>。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八《史部编年类存目·宋元资治通鉴》。

<sup>②</sup> 《清太宗实录》卷三二。

<sup>③</sup> 康熙在《全金诗序》中说：“……太原元好问撰《中州集》，以人属诗，后世有诗史之目，而浑源刘祁亦著《归潜志》，可与《中州集》相参互证焉，盖其人文之可考者，犹赖此两书之存也。顾金去今垂六百年，其礼乐声明载在艺林之咏者，若非《中州》、《归潜》二书，后之人亦乌从而知之？”

<sup>④</sup> 清高宗《金章宗》诗末夹注云：“章宗即位以后，未尝不知治体，然偏以典章文物为急，而诘戎肆武之道弃之如遗，遂尽变祖旧风，国势日就孱弱。……渐至沦胥，金源之业盖衰于章宗矣。”《御制诗集》第四集卷四九。

<sup>⑤</sup> 陆陇其：《读金史世宗本纪》，《三鱼堂文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明确指出金的衰亡与汉化无关。赵翼则认为“金以坏和议而亡”<sup>①</sup>，李慈铭说金之亡国“惟宣宗一败之后，即迁汴都，为大失计耳”<sup>②</sup>。他们对于金亡的不同看法可以反映清朝士人与政府对金文化思考的差异，或许还包含了士人对当时政府以历史反思为名而行满汉对立之实的质疑也未可知。

金朝的历史研究在清代出现了兴盛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对金代史料所进行的记录、整理、辑佚、订正和考异，这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杨陆荣因不满意元明以来诸家宋元编年史书一贯把辽代历史和金代历史附于两宋历史之下的偏颇之见，而以辽金二史单独成编的《辽史金史纲目》；万斯同为金朝诸帝、将相功臣所作的表，后来收入《二十五史补编》；赵翼、钱大昕对官修《金史》的校勘和考证；杭世骏、卢文弨的《补金史》；施国祁的《金史详校》；张金吾收集金代遗文而成一百二十卷的《金文最》；李有棠纠正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以两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的偏颇做法，为弥补金代史料采摄不全的缺陷而编撰的《金史纪事本末》等。

然而在清代，辽金二史被视为边疆史的态度仍然占据主流。比如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于辽金事不太厝意，亦与明人等”<sup>③</sup>。而被当时学者极为推崇<sup>④</sup>的《续资治通鉴》虽然将辽金蒙元之事与宋事并提，但以宋元的纪年为主而辽金附于其下的编年方式，还是透露出当时学者的王朝正统观。

## （二）民国以来的金文化研究回顾

民国初期的金史研究一方面被纳入满洲先世的追溯中。如孟森《清朝前纪》、章太炎《清建国别记》通过多方史料的梳理辨明满洲

<sup>①</sup>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八《金以坏和议而亡》。

<sup>②</sup> 李慈铭：《越漫堂读书记》卷八《归潜志》。

<sup>③</sup>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sup>④</sup> 张之洞曾在《书目答问》说：“明人续《通鉴》者甚多，有此皆可废也。”

先世的历史。一些学人还译介了日人的著作，如稻叶岩吉（号君山）的《清朝全史》和《满洲发达史》先后由但焘和杨成能翻译并在国内出版。稻叶岩吉的著作中不是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东北部，而是将满洲作为与中国、蒙古、朝鲜、俄国及日本处于对等位置的一个“独立”的历史世界。另一方面，金代的社会文化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文学领域中有冯式权《两宋同辽的杂剧及金元院本的结构考》、王礼培《论金元两代诗派》、许文玉《金源的文圃》，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船山学报》和《小说月报》。王国维于1926年和1927年分别发表了《金界壕考》《辽金时蒙古考》。在女真语言文字方面主要有罗福成的《宴台金源女真书碑考》《女真书碑考释》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将中国学术界东北边疆史地和金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带入新的高潮。这一时期在史料整理方面的成果有陈述《金史氏族表初稿》<sup>①</sup>；朱希祖《伪齐校补》《伪楚辑补自序》；毛汶《南迁录纠缪》<sup>②</sup>；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sup>③</sup>；冯家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等。

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宋金关系方面的研究论著尤多。如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第4卷第1期，1933年）、缪凤林《宋高宗与女真议和论》（《国风》第8卷第2期，1936年）、翦伯赞《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中苏文化》第6卷第2期，1940年）等<sup>④</sup>。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也是在上述背景下撰写出版的重要著作。

尽管这一时期对于宋金文化的研究主流仍然立足于族类的对立，强调女真族与汉族文化上的异质，但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已经开始有学者注意到了金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特性，指出金代文学“华实并

<sup>①</sup>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3分册，1935年。

<sup>②</sup> 《国学论衡》1935年第5期，这一时期毛汶关于辽金史方面发表的文章最多，辑成《辽金国事史论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sup>③</sup>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3分册，1936年。

<sup>④</sup> 参见刘浦江《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茂，风骨遒上，绝胜江南之柔弱”<sup>①</sup>。在金毓黻编撰的《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中也特别彰显金代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宋辽金史》一书中，他还特别提出要“三史兼治”，摒弃以宋为正统，“斥辽金史为不足观”的“偏狭之见”，主张三史并重；在治本期史方法上则提倡“三史互证”<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界对金史的研究仍然关注于金宋关系，尤其是以宋为视角的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如邓广铭《岳飞传》《南宋对金斗争的几个问题》、何竹淇《岳飞抗金史略》、张毓芬《李纲和宗泽的抗金斗争》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通史教材的编写上，辽金史一直是附于宋史之下的。如尚钱《中国历史纲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直到1979年，蔡美彪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第6册（辽夏金卷）（人民出版社），才改变了这一通史体系，开始将金史放在与宋史对等的地位上进行研究。1982年6月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金史及金文化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先后出版了多部论文集，如《辽金史论集》《宋辽金史论丛》等。其中有关金史的论文所涉及范围更是遍及金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关金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方面都出现了专门性的论著。金文化的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但研究的视野明显加宽。

在理论的探索方面，吉林大学张博泉教授在研究东北史和辽金史的基础上，于1986年提出“中华一体论”<sup>③</sup>的观点，并且具体分

<sup>①</sup> 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sup>②</sup> 金毓黻：《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sup>③</sup> 张博泉：《“中华一体”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5期。1995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一书。此书依据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实际和理论，提出统一就是一体，多民族就是多元，也就是“中华一体”。并且重新解释了南北朝在历史上的含义，提出南北朝出现的完整的历史前提，即统一——诸民族政权的割据——南北朝——统一，都是发生在自己的国家与自己国家的民族中，南北两朝都是对中原王朝的继承与发展，都是出现在中原的土地上，是把整个中原分为南北。建立南北朝的共同特点，即继承先王的土地、先王的人民和先王的制度。南朝主要行汉制，北朝也主要行汉制，所以南北朝都是中原的王朝。所不同的是，北朝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并为统治民族；南朝是由汉族建立的，并为统治民族。

析了“征服王朝论”与历史上正统观的不同。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长篇演讲<sup>①</sup>，明确指出女真族是国内民族，金朝同宋一样也是中国，从理论上认同了金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两位学者用各自的话语探索和阐述了一个大体相同的命题，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拓宽了金文化研究的视角。根据这一理论，张博泉进一步对金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总体阐述。他认为金代文化的特点主要有中原文化北移；儒道释三教合一；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发展了各民族文化。认为金代文化的发展足以与南宋并存，于辽元之间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的作用。<sup>②</sup> 宋德金则认为章宗朝开始的德运之议，标志着金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完善。金朝的正统观推动了金代文化的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sup>③</sup> 周惠泉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也明确提出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sup>④</sup>

学界对多民族历史的认同使得金文化的研究有了较为平等的视角，既关注金文化形成中汉文化的影响，也注意到其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和多民族性。有些学者侧重从总体上关注汉文化对金文化的影响。如张晶认为，金熙宗、金世宗和金章宗三朝采纳汉法、汉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熙宗时侧重于“礼”，世宗、章宗分别着重于“仁”和“文”。还特别强调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在金王朝巩固对中原

<sup>①</sup> 这篇演讲的文字稿于次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文中提出辽金是后北朝时期，它是对前北朝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不是直接延续的，而是经过两个北朝之间再统一的酝酿和准备。在中国隋唐的酝酿中为后北朝的再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其中包括儒家思想的准备。

<sup>②</sup> 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论金代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sup>③</sup> 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sup>④</sup> 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汉地的政治统治过程中具有积极意义。<sup>①</sup> 赵永春认为金朝提倡学习汉文化，注意发展女真本族文化，允许各种宗教传播，实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但不准任何不利于金朝统治的思想传播。<sup>②</sup> 有的学者则具体地从儒学或理学对金文化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主要成果有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sup>③</sup>、宋德金《金代儒学述略》<sup>④</sup>、张博泉《略论金代的儒家思想》<sup>⑤</sup>、魏崇武《金代理学发展初探》<sup>⑥</sup> 等。还有学者则将关注视点投入到金统治下的汉族士人对金文化的影响。如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其研究侧重于金元之际中原地区儒士的境遇、去向和文化上的贡献。<sup>⑦</sup> 孟繁清《金元之际的燕赵文化人》研究范围主要为燕赵地区。<sup>⑧</sup> 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sup>⑨</sup> 一书，则着重讨论汉族士人在金代社会发展中作用、其政治地位的变迁与女真族封建化进程。

在金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和多民族性方面，金文化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了金宋间的交流及在交流中金文化的自我变迁，比如孔凡礼的《南宋著述入金述略》<sup>⑩</sup>、宋德金的《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sup>⑪</sup>、薛瑞兆的《论金国与南宋的艺文交流》<sup>⑫</sup> 等。特别是 2006 年北京大学的重大项目“10—13 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研究成果的结集出版，清晰地表达出学界对辽宋金元时期文化研究视角

<sup>①</sup> 张晶：《试论金代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排拒》，《社会科学辑刊》1991 年第 2 期。

<sup>②</sup> 赵永春：《论金代文化政策与思想控制》，《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 2000 年版。

<sup>③</sup> 《元史论丛》第 2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sup>④</sup> 《辽金史论集》第 9 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sup>⑤</sup> 《社会科学辑刊》1999 年第 5 期。

<sup>⑥</sup> 《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sup>⑦</sup>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sup>⑧</sup> 孟繁清：《金元之际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sup>⑨</sup> 王德朋：《金代汉族士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sup>⑩</sup> 《孔凡礼古典文学论集》，学苑出版社 1999 年版。

<sup>⑪</sup> 宋德金：《辽金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sup>⑫</sup> 《民族文学研究》2007 年第 1 期。

不再偏重于南北军政的对立，而更加注重多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sup>①</sup> 刘浦江《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一文中提出宋代利用禁令构建的“文化边界”，依旧阻挡不住南北中国的书籍流通和文化交流。林煌达则在《从金代主事一职看边疆民族对中国官僚体系的影响》<sup>②</sup> 一文中提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在典章制度上未必完全承袭汉制，而是因时制宜，更可能影响到汉人官制的设计。在对元好问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张博泉就提出元好问学术思想的多元性，认为其主源是对隋唐以来变革的儒家思想的继承，次源是对佛道有选择的吸收，本源是金代本朝思想。<sup>③</sup> 李正民《关于元好问金亡后活动的评价》则认为，元好问治学所走的道路是金代文派正宗的规范，兼收各家之长，肯定了元好问的历史观是将辽金元纳入正统，把唐、辽、宋、金、元作为一个国家的朝代更替来看待。<sup>④</sup> 还有研究者从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一事来说明他没有严格的民族界限之分，而郝经“能行汉法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主”的主张正是元好问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sup>⑤</sup>

我国台湾地区金史及金文化研究的风气是由一批大陆赴台学者如姚从吾、李符桐、杨家骆等人所奠定。<sup>⑥</sup> 在金文化研究中较多地关注汉化问题，先后发表了姚从吾《金世宗对于中原汉化与女真旧俗的态度》<sup>⑦</sup> 《女真汉化的分析》<sup>⑧</sup>、陶晋生《金代初期女真人的汉化》<sup>⑨</sup> 等文章，并提出金世宗是一个特殊的征服王朝君主，其个人对汉文化颇有造诣，但又致力于恢复女真文化。为了满足教学需

<sup>①</sup> 张希清、田浩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

<sup>②</sup> 刘浦江文与林煌达文则见于《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一书。

<sup>③</sup> 张博泉：《元好问的学术思想及其特质》，《忻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sup>④</sup> 李文见于《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sup>⑤</sup> 唐国军：《元好问的民族观初探》，《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sup>⑥</sup> 萧启照：《台湾辽金元史研究述要》，《辽夏金元史教研通讯》2002年第1期。

<sup>⑦</sup>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52年第4期。

<sup>⑧</sup> 《大陆杂志》1953年第6卷第3期。

<sup>⑨</sup> 《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68年第17期。

要，一些学者还编写了有关辽金元三朝史的教科书，主要有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sup>①</sup>、陶晋生《中国近古史》<sup>②</sup>、王明荪《宋辽金元史》<sup>③</sup>、赵振绩《中国历史图说辽金元》<sup>④</sup>等。对金代文化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是陶晋生，他的《女真史论》<sup>⑤</sup>一书从几个层面探讨金代的文化问题。比如世宗时代的女真本土化运动，章宗时代的文化正统论，以及女真文化与南宋的交互影响。他认为在 1200 年前后，金代出现了社会文化变迁，女真风俗文化大量消失，但在汉族文化中却能够看到它的影响。

域外学者对金史的研究要首推日本。自明治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政府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征服满蒙乃至中国策略的背景下，不少一流人才投入辽金史的研究领域，如外山军治、三上次男、曾我部静雄等。<sup>⑥</sup> 50 年代以后，田村实造等学者利用“征服王朝”理论并结合对北亚民族的讨论成果分析金朝的国家性格，先后出版了田村实造的《中国征服王朝研究》（1964）、《征服王朝——金朝与汉》（1974）。不过在外山等学者淡出学界后，除道教研究领域外，金史研究的其他方面渐渐沉寂。有日本学者甚至认为近年来日本几乎不存在金史研究者<sup>⑦</sup>，这个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也反映了日本学界金史研究的无奈。

<sup>①</sup> 此书由台北正中书局于 1973 年出版，是姚氏为台湾大学辽金元史课程所编写的讲义。台湾学者称之为“第一部在台湾著作出版的辽金元史教科书”。

<sup>②</sup> 台北东华书局 1979 年版。

<sup>③</sup> 台北众文图书公司 1981 年版。

<sup>④</sup> 台北世新书局 1984 年版。

<sup>⑤</sup> 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 1981 年版。

<sup>⑥</sup> 外山军治的《金朝史研究》、三上次男的《金代女真研究》、曾我部静雄的《宋金的抗争》。

<sup>⑦</sup> 细谷良夫：《日本对金史、满族史和女真史的研究》，王禹浪译，《辽金史论集》第 9 辑，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 页。